

前 言

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卞崇道

日本近代哲学,一般是指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 年)这一期间的日本哲学。本书评介的十位哲学家就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作为代序,本文主要是对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概貌、源流和特点,勾勒出一个轮廓,便于读者对这十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一、日本近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日本近代哲学的产生是与明治初期的启蒙运动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日本的启蒙运动是指从明治维新(1868 年)到明治十年间以“明六社”(于明治六年成立的学术结社)的思想家们为代表所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产生的国际背景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并染指亚洲诸国;国内背景是,在幕府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又直接面临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了明治政权,着手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路

线。在思想界，洋学家的认识已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佐久间象山语）发展到关心西方近代社会政治理论乃至西方社会的近代文明。国际国内的这种背景，决定了日本的启蒙运动必然以对抗西方列强，加速建设资产阶级近代国家为课题，以自主地导入西方近代思想和社会文明为基本特征。但是，日本的启蒙运动无论在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提并论。因为它虽提倡民主主义，却更重视国家主义；它虽推崇理性，却以儒教的眼光来认识西方近代文明；它着意汲取的是19世纪欧美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总之，它不仅历时短，而且内容庞杂，理论肤浅，更缺乏民主主义革命的光彩，只能说它是欧洲启蒙运动在这个东方岛国的历史回响。

日本启蒙运动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成为日本近代哲学产生的启端。日本启蒙思想家首推西周（1829—1897）他受幕府派遣于1862年留学荷兰，在莱登大学就学于维塞林。西周留学期间，荷兰盛行孔德、穆勒、边沁的实证主义哲学，而维塞林就是实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西周深受其影响。归国后，他努力介绍和传播实证主义哲学，成为日本第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将西方哲学比较系统地导入日本的人，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特别是在伦理学上，西周都有所建树，在哲学范畴、概念和术语的翻译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津田真道（1829—1903）是与西周一起留学荷兰的又一位思想家，他在莱登大学学习社会科学，接受了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在哲学上致力于移植和传播实证主义哲学。津田大力提倡“实学”，反对“虚学”；主张无神论，提倡功利主义宗教观、伦理观，否定封建禁欲主义，具有较多的倾向于唯物主义。

的观点。启蒙运动中著述最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思想家是福泽谕吉（1835—1901）他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福泽的哲学思想基本上也是取之于实证主义。他强调“实学”，重视经验科学；大力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以“天赋人权说”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思想，倡导平等、独立自主和社会契约论，在当时日本国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文明论成为日本建立资产阶级文明国家的理论纲领。

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通过介绍和移植西方近代哲学，总结了以儒教、佛教和神道教为核心的日本传统哲学，产生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日本近代哲学。明治中期，日本哲学界由初期介绍和移植英法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哲学转而介绍和移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哲学界开始分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道扬镳。这一变化，既反映和适应了明治政府渐趋保守的政治需要，同时也反映了哲学自身发展的深化。前期的启蒙思想家多是百科全书式的人，而不是专门哲学家，他们关心的基本方向在于如何改造和重新组织日本社会。因此，他们注意并且移植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基础的哲学思想，借助孔德、穆勒的哲学批判以儒学思维方法为基础的世界观的非理性，试图建立近代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但是，他们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论及其发展的认识是肤浅的，他们一方面以批判传统的儒佛思想为契机而接受西方哲学，同时又以儒佛思想作为理解西方哲学的钥匙，因而不可能深刻认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异质性。进入明治中期，日本思想家则在同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相区别的意义上开始认识和介绍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哲学理论本身，也就是开始吸取所谓“纯正哲学（指形而上学）亦即德国古典哲学”开创了日本学院派哲学。这个时期，唯物主义已从启蒙家的实证主义思想中分化出来，中经加藤弘之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发展到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明治

资产阶级唯物论的顶峰。

日本学院派唯心主义哲学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和大西祝(1864—1900)。当时在政府“奖励德国学术”的政治空气中,东京大学副教授井上哲次郎被选派到德国研究哲学,归国后升任教授,开始在大学里系统地介绍德国唯心论哲学,创立了日本学院派哲学。井上提出的哲学基本命题是“现象即实在论”意指现象与实在是“同体不离,二元一致的”,是一个事物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象和实在的统一构成世界。他认为人能认识现象,但无法认识实在,然而人可以通过“直观”间接地获得关于实在的观念,这种实在既非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人从主观出发获得的实在是“心的实在”,从客观出发获得的实在是“物的实在”,而“心的现象”与“心的实在”也是同一的不可分离的,人的精神包含着“心的现象”和“心的实在”两个方面。这时候,现象即实在,实在即精神。井上为从哲学上综合东西方文化所提出的这种把物心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实在论,最终是把实在归结于精神,其实质不过是把东方佛教的“心”和西方主观唯心论的“物”结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井上开创的学院派哲学所兴起的是非理性的思辨哲学之风,这对于启蒙思想家宣传的理性主义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乃至反动。但是,井上的哲学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它在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本体论——现象与实在,亦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

学院派哲学的另一个开拓者是 大西祝。大西与井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也是沿着学院派哲学的基本路线,致力于移植德国“纯正哲学”,进行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不同点在于他反对井上的国家至上主义立场和露骨的反启蒙主义倾向。大西站在批判主义立场上,对东西方各种思想进行比较、判断和批判,并认识其倾

向和价值 写成巨著《西方哲学史》这是日本第一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著作。他的《伦理学》一书标志着日本伦理学史的开端。大西不仅首次在大学里把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讲授，同时还在《六合杂志》上发表文章 把哲学普及到社会上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启蒙家。与井上不同，大西是从批判主义的理性中去寻求“东西文化综合”的支柱，从而向前推进了前期的启蒙主义，被称为“日本的康德”。日本学院派哲学在创立期以井上哲次郎和大西祝为代表的对立给予后来的日本哲学的发展以很大影响。

在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同时，明治唯物主义哲学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明治十年代日本哲学界由启蒙思想家的实证主义哲学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化的过程中，加藤哲学代表了刚刚从实证主义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加藤弘之（1836—1916）是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自 1884 年日本创立哲学会以来，他任会长 30 余年 从事著述活动 50 多年。加藤是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之一，但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明治十年代之后的论著之中，《自然界的矛盾与进化》（1906）、《自然与伦理》（1912）是其代表作。加藤哲学的特点，“在于把‘物理主义’（泛指自然科学 彻底地导入心理学领域 泛指社会科学）打破‘心理’世界存有超越于‘物理’世界法则的二元论的‘妄想主义’，从自然科学角度来处理社会科学和哲学问题”^①。但是 加藤在力指运动、精神 指物质 关系上主张‘力物平等’的折衷主义 这就使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顺着‘力物平行’的斜坡 慢慢地向唯心主义泥潭滑行 带有重新导致‘二元论’的危险。在关于运动发展原因的解释上，则彻底陷入唯心主义。加藤

① 永田广志《日本唯物论史》法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164页。

唯物主义哲学的这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反映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日本资产阶级由进步转向保守的需要。

中江兆民（1847—1901）是明治唯物论哲学的真正代表。他曾留学法国，深受法国启蒙文化的影响，崇尚卢梭，热情地宣传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被誉为“东洋卢梭”。中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经过前期（1881—1887）的探索而逐步成熟，到后期写作名著《续一年有半》（1901）时，形成了比较有系统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中江在此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佛、无神、无灵魂的纯粹物质学说，以对抗各种宗教唯心论和实证论，从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坚实基础之上。中江还论述了时空的客观性、无限性，时空与物质世界不可分离性，批判了康德的先验时空观和实证主义不可知论的时空观。在认识论上，中江提出“窗口说”，认为人是通过感官这个“窗口”来反映和认识外部物质世界的。中江立足于唯物主义哲学基石上，提出了战斗的无神论思想，批判了宗教有神论。当然，中江哲学也不能避免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机械性和唯心史观的共同缺陷，而且也还没有形成完整、严谨的哲学体系。然而，在井上哲次郎等人大力移植德国唯心论哲学，西村茂树、井上园了等人试图复兴儒、佛并使其哲学化的思想潮流中，中江继承德川时代日本唯物主义传统，把明治启蒙思想家的实证主义思想中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纯化出来，提高到哲学唯物主义高度，公开阐明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正确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作了理论准备。

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昭和前期（1945年止）是日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妄图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军国主义时期。在哲学领域，一方面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代表，继承

并发展了由井上哲次郎和大西祝开创的学院派哲学，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日本传播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作为哲学家，他的活动涉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长达40余年。西田哲学是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并用西方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种东方哲学，是具有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1911年西田发表他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善的研究》提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纯粹经验”宣告了日本最初的也是第一个独创哲学的形成。继之，西田又提出了另一个独特的哲学概念“场所逻辑”，标志西田哲学由前期进入中期。“场所逻辑”是“纯粹经验”在扩大和深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赋予“唯一的实在”的纯粹经验以逻辑基础。从1932年出版《无的自觉限定》起，西田哲学进入后期。为了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西田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逐步增加了一些客观成份，使“场所”思想发展到“辩证法世界”的思想，并且又提出一个最能表达其哲学特征，也是最难理解的概念“行为的直观”。总之，西田哲学在理论上与西方诸哲学体系相比，具有自己特点，带有东方哲学的特点，它与神、儒、佛等日本传统思想相比，带有近代哲学的性质。它承袭了井上、大西等开创的学院派哲学，但又远远超出其前辈，形成了具有独特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哲学体系。西田哲学不仅在战前，而且在当代都为日本哲学界引为骄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西田哲学不过是现代唯心主义的东方形态而已。

田边元(1885—1962)是西田哲学的继承人，田边哲学被认为是仅次于西田哲学的又一独创性哲学。它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种的逻辑”这一概念上。这里的“种”是指个体、种、类之中

的“种”。田边认为“种”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契机，谓之“基体”。也就是说，“种”是民族、阶级、国家等所谓社会的基体；“种的逻辑”即是社会存在的逻辑。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应当通过个体、种、类三者互相否定的中介方法来把握。这样，田边通过赋予现实存在的国家以“种的逻辑”基础而使其变得合理化、神圣化了。因此，田边哲学在政治上起着维护日本天皇制国家的作用。

以西田、田边为代表的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生，一方面表现着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移植、接受转化为日本近代哲学，因而与非近代的“传统思想”相对立；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哲学是以日本资产阶级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殊环境为条件，在市民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意识”与专制主义的国家主义“国民意识”的矛盾之中所形成的独自的近代形而上学。伴随历史的发展，为了同天皇专制主义的法西斯思想相适应，它自动地屈服于传统思想之下，并且进而和法西斯思想相结合。

这个时期，与上述学院派唯心主义哲学相对应，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日本传播并且与日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出现了战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鼎盛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被日本所接受并得到传播，除了社会实践的需要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当时已经具备了传播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上所述的日本唯物论哲学的理论准备；二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自明治 20 年代起，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就传到了日本，但是，在日本真正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一批早期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代表有片山潜、幸德秋水 and 堺利彦。他们通过创办刊物、翻译马恩著作和撰文著书，向日本国民介绍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还缺乏深刻理解与认识，但他们在自

的著作中都不自觉地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他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客观上必然要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被注视并被正式提出来，是在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20至30年代）主要是由河上肇、栉田民藏等人力求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提出其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河上肇与福本和夫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福本和夫曾是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和理论活动家，他积极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且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很多为日本所不知的重要的基本观点。虽然福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存有很多缺陷，甚至曲解和错误，但是，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他对河上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不仅促进了河上本人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而且提高了日本哲学界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正如河上肇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一文中所指出：“最近 福本和夫在日本最广泛的使用‘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这一术语，由此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①。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湛研究及向日本和中国传播的业绩是众所周知的。

福本、河上的争论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心，三木清就是关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在哲学界卷起一阵旋风的人物。三木哲学的出现以及围绕三木哲学展开的又一场争论，使日

河上肇主编《社会问题研究》第80册 第32—33页。

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到单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混同是错误的，进而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进入 30 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一方面向日本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动向和成果；一方面以此为理论武器，勇敢地批判“全体主义”、“日本主义”、“皇道主义”等种种非理性主义思潮。1932 年以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1900—1945）为首，有三枝博音、永田广志、船山信一等 40 多人参加的“唯物论研究会”（以下简称“唯研会”——笔者）创立，发行会刊《唯物论研究》。“唯研会”活动六年半，出版 65 册会刊和 50 册《唯物论全书》，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产。“唯研会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战前日本传播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比较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中所占有的理论基础的地位；其二是通过确认自然辩证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加深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理解，从而使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上；其三是以哲学的列宁阶段为中心课题，对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的同一性问题展开了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其四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展开了对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唯研会”的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取得了确定的地位。

二、日本近代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流

通过对日本近代哲学发展轨迹的粗略描绘，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近代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流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哲学及日本

传统思想两个方面。

(一) 西方近代哲学的源流

幕府末期，日本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西学研究历程，尽管它被严格地限制在科学技术方面“和魂洋才”)但也为后来移植以哲学为核心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的成功，打开了全面导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文化思潮的闸门。从哲学的角度看，首先被移入的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当然，实证主义首先被移入并非偶然，它既有输入者在实证哲学流行之际留学西欧的直接机遇，又有日本当时急需实行资本主义近代化指导理论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实证哲学被移入日本后所起的重大作用在于，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哲学的产生。通过对西方实证哲学的介绍，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到西方有着异于东方的哲学体系。与东方思想重政治、人伦比较，它以重知识为根本特征并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西周把 *Philosophy* 定译为“哲学”时起，日本人就开始探索建立“哲学”意义上的日本哲学。明治初期的启蒙哲学则是这种探索的第一株果实，它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先驱形态；它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在哲学上，它以实证哲学为武器，批判东方儒学文化；同时吸取实证论、经验论哲学，改造儒学的理学观，建立含有实证意义的“实理学”，从而把“虚学”改造为“实学”；它取西方哲学重逻辑之长，强调归纳与综合。在伦理道德观上，它吸取穆勒的功利主义，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提出独具特色的“人生三宝说”(西周)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它倡导西方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强调法治。在历史观上，它在基佐、巴克尔历史学影响下，主张文明史观(福泽谕吉)。总之，明治启蒙哲学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其源，又密切结合日本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根本性质大体属于唯心主义，但又包含有倾向唯物主义的

合理因素，从而为明治中期的哲学分化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明治十年代，日本启蒙运动衰落。继实证哲学之后，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风靡日本思想界。以创设不久的东京大学为中心，起初主要由自然科学家或曾学习过自然科学的人，把进化论作为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接受；尔后有一些搞社会科学的人则接受和宣传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趋势既适应明治政权向保守方面转化这一社会、历史的条件，又顺应了欧美思想界的新动向。从哲学上看，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为明治中期思想界的论战分别提供了理论武器。自明治十年代起，在日本思想界由启蒙思想分化出两大营垒：一是宣传自由民权思想的阵营，一是提倡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阵营。前者吸取进化论哲学秉承18世纪启蒙哲学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强调人在自然法上的自由、平等和权利的进取精神这一积极的侧面，作为他们主张自由民权的理论根据；后者则吸取进化论哲学中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生物学的目的论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合理化的保守化这一消极的侧面，作为其倡导国家至上主义的佐证。围绕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明治15年出版）展开的论争即所谓“人权论争”就是上述二大阵营间展开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典型。前者发展到接受卢梭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中江兆民的唯物论哲学；后者导致移植德国唯心论，促成井上哲次郎和大西祝初创日本学院派哲学。可见，进化论哲学在明治启蒙哲学的分化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明治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形成的一个理论来源。

明治唯物论主要包括加藤弘之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唯物论、植木枝盛的无神论和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加藤的唯物论主要源于进化论，植木从否定神的存在到主张“尊人说”以及中江唯物论，主要源于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哲学中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和

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以明治 20 年前后为分水岭，日本思想界从前期移植 19 世纪英、法哲学转而移植德国唯心论哲学。从 1884 年（明治 17 年）东京大学创设“哲学会”发行《哲学会杂志》（1893 年更名为《哲学杂志》）到明治 20 年代中期，是日本移植德国哲学的创始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以德国大学哲学教科书为依据、翻译或编译许多有关哲学概论和哲学史概要的著作。经过这一段的准备，日本哲学界迎来了对于西方哲学的真正研究阶段。从明治末期到大正中期，它主要集中于研究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京都大学成为这股新风潮的来源。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前期，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取代康德哲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哲学诸流派，如实用主义、实存主义、生命哲学等也相继涌入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日本来说也被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导入。因此，可以说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介绍、研究和移植西方哲学是日本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如此，它也是日本哲学家创建自己哲学体系不可缺少的理论和思想资料。井上哲次郎的“现象即实在论”取自德国古典唯心论，大西祝的批判主义源于康德哲学，西田哲学、田边哲学的形成更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日本近代哲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源泉。

（二）日本的传统思想是日本近代哲学产生的又一源泉。

所谓日本的传统思想，本文是指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思想，主要包括儒教、佛教和神道教的思想。它们不仅构成古代日本思想和文化的实体，而且对于近代日本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哲学的一个构成部分。

首先看日本近代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我们知道，明治启蒙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德川封建文化；与

此同时,大力移植西方哲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启蒙运动中,儒学并未被完全清除。相反,由于日本启蒙思想家都有接受儒学教育的亲身体验,汉学修养较高,因此在他们面对西方思想之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囿于儒学的眼光,导致日本启蒙哲学中存在着含有批判儒学与残留儒学这样双重性的矛盾。

明治中期,日本哲学界在移植德国哲学的同时,出现复兴日本传统思想的思潮。元田永孚(1818—1891)率先抛出《教学大旨》,再次提议把接受西学限定在科学技术领域,而以儒教的“仁义忠孝”作为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这种明目张胆地复“和魂洋才”之旧的主张,并非政府之所求。政府所要求的不是直接利用传统思想,而是要借用西方哲学给传统思想涂上近代的油彩。西村茂树(1828—1902)的《日本道德论》就是这样的杰作。他认为,“若只以儒教欲立本邦道德之基础,在今天亦不可能”。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忠孝之道”取于儒教,“考究极其精微”之点取于西方哲学,从而给儒学披上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时装。一直到战前,儒学作为一种思潮虽然再也没能占据统治地位,但它作为日本近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却始终没有中断。

其次是日本近代哲学与佛教的关系。同儒教一样,佛教日本化之后便成为日本传统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近代虽受“毁释废佛”之打击,然则因佛教徒展开“护法运动”,终获独立发展的权利。在明治中期复兴儒佛时,佛教也适应新时代的潮流,采取佛教哲学化的新形式。井上园了(1858—1919)是进行佛教哲学化尝试的代表。他以德国唯心论哲学为中介,重新审视佛教思想,认为佛教思想不仅与普遍真理一致,而且有助于皇国日本的独立发展。譬如他借助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1853—1932)的《势能论》解释佛教的根本思想:“万法是真如,真如是万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认为奥斯特瓦尔德的势能论也适用于

“真如”与“万法”、“空”界(超越的世界)与“色”界(感觉的经验的世界)的关系,提出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形而上学一元论。他进而以能量等于“灵性”为原理,展释其进化论的宇宙论,以此批驳基督教与唯物论。井上就是这样以自然科学中能量守恒规律来解释佛教的灵魂不灭说,以达佛教哲学化之目的。

在其后被称为创造了日本型哲学的西田、田边、三木、和辻哲郎等人的哲学思想中,也无不渗透着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西田在青年时代曾徘徊于人生十字路口,后投身佛门,坐禅求道十年,才悟得东方思想的真谛,著成《善的研究》。朱谦之(1899—1972)教授认为:“西田哲学第一是宗教的哲学,第二是东方型的宗教的哲学,第三是以‘无’之逻辑为基调的宗教的哲学。”^①这一分析从本质上揭示了西田哲学与佛教思想的源流关系。田边哲学也离不开佛教,他在其思想展开的中期,即提出独自の“种的逻辑”的时期,出版了《正法眼藏的哲学我见》(1939),探索道元的主著《正法眼藏》的哲学思想,把宗教家道元看作是超越了传统宗教的束缚,进行形而上学思索的日本哲学的先驱。战后,田边又笃信亲鸾,以净土真宗的他力教作为指导思想,著成《忏悔道的哲学》(1946),以从“忏悔道”到“菩萨道”终其一生。三木清在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和人生迭宕之后,也倒向净土真宗。这都表明,在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中,佛教始终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关于日本近代哲学与神道的关系。神道教是在日本民族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行为,是日本固有的宗教。从哲学思想上看,神代传说依据朴素的最善观,^②推导出以天皇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09页。

参阅村冈典嗣著《日本思想史研究》第4卷,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104—110页。

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即皇国主义是最善美的。妄称世界即日本，日本即世界。到了近代，特别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这种神道哲学曾被当时日本政府奉为对外侵略，对内控制人民的精神工具。思想界一些人也借用神道，公然提出日本主义、皇道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要求确认万世一系的天皇是“肇国精神”的化身，坚持对于天皇的原始信仰，并且炫耀日本“冠绝万邦”赞誉“日本精神”之伟大。所谓“日本精神”就是神国精神，也就是“大和魂”。他们认为“日本精神”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因为它有神国、天皇这一生命源泉。因此，日本国民要崇敬天皇，弘扬“日本精神”，共建“东亚新秩序”。不言而喻，这种皇道哲学是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的反动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近代哲学与传统思想虽然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但传统思想总是适应新时代的条件，以各种不同形式对日本近代哲学产生着影响，成为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日本近代哲学的特征

通过对日本近代哲学产生、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们大体上可以总结出日本近代哲学的下述几个特征：

（一）移植外国哲学的特征。

在谈论日本哲学的特征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是日本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是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论题是由日本近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提出的。他在其著作《一年有半》中提出：“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①对

①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此田中王堂(1867—1932)在《运动一元论和〈续一年有半〉》一文中加以反驳：“在日本，乍一看哲学好像仅仅是从中国和印度移植的。可是日本也有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神话、历史和习惯。这是政体不同的日本国根据审美和实践的需要，一千年来积极介绍并且变革外来思想的结果。这一事实不就自然使我们能够推论到日本也有不同于中国和印度的哲学思考吗？”以后，赞同及持反论者均为数不少。我们认为，中江的论题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始是否就是日本哲学的开始？也就是说，在移植西方哲学之前，日本的传统思想是不是哲学的问题。二层是日本近代哲学的开始是否仅是由于移植西方哲学这一外在原因所致，还是更多的是由自身的内在原因引起的问题。这二层意思可归结于一，就是如何理解日本哲学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我们认为日本有哲学而且非始于近代。因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民族思维的最高形式。任何一个有文化、历史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思维，只不过各个民族哲学所采取形式、所言及的内容以及发达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已。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从字面上，而要从民众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上去理解中江名言的真实含义。他是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提出以下原则来要求和衡量哲学和哲学家的，即在哲学上持有鲜明坚决的态度、承认世界是客观的、物质的（即无佛、无神、无灵魂）也就是坚决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摆脱宗教教条，突破前人之说，树立自己独特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考虑，中江论断的重点不在于说明日本古代没有哲学，而在于强调日本现在没有哲学。因为明治时代（截至中江名言提出的明治34年）